

人力资本、经济结构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

宋 晓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及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从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 对中国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受教育程度一般、接受过就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流动人口, 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流动人口迁入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 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提出了旨在促进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流动人口; 从业状态; 人力资本; 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5-0087-08

Human Capit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loating Population's Employment Status

SONG Xiao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0 from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he data in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09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floating population's employment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draw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have ordinary educational level,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richer working experie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employed; the higher industrial relative labor productivity ratio and the lower grain spending proportion of urban residents wher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ove in, the greater possibility they are employed. An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promoting floating population to obtain employment.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ment status; human capital; economic structure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深化城乡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

收稿日期: 2011-09-25; 修订日期: 2012-05-15

作者简介: 宋晓 (1987-), 安徽六安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人口经济学。

迁移, 经历着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城市化进程, 流动人口数量多、增长快。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0》, 1982 ~ 2009 年,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由 657 万升至 2.11 亿^[1];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 1 号)》, 2010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动人口^①达到约 2.61 亿, 占总人口的 19.51%, 比 2000 年“五普”时增长约 81.03%。

数量庞大且增长迅速的流动人群, 既是打破劳动力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 实现城乡、区域融合和协调发展, 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力量, 也对中国人口管理和城市管理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近年来, 有关机构和人员及政策规划中多次提到了做好流动人口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思路。2007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 在讲到“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时, 明确提出“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能实现立足城市并进而融入城市的根本保障是经济收入, 而经济收入的基础则是就业。所以,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 进而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市中实现就业。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就业的因素, 不仅有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上的差异, 也有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环境上的差异, 即流动人口能否实现就业, 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二、文献回顾

1. 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费希尔 - 克拉克假设 (The Fisher-Clark hypothesis) 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对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做了最早的系统考察^[2]。费希尔 (A. G. B. Fisher) 首先提出了劳动力转移不仅是个总量问题, 更是一个结构问题。1935 年, 他在《物质进步的经济含义》一文中, 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转移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三点基本假设: ①一国的经济部门可以划分为第一、二、三产业,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可以用第一产业劳动力在所有产业劳动力中的比重来衡量, 即用就业结构高度来衡量经济发展高度; ②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可以用经济结构高度 (三次产业结构) 来衡量; ③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必然同时是就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 而就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必然同时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区域间广泛转移的过程。

1940 年, 统计学家克拉克 (Colin Clark) 根据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人口历史统计资料验证并补充了费希尔假设。他发现, 落后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同时就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从 80% 左右下降到最发达国家的 10% 以下的过程。克拉克进一步指出了劳动力发生上述转移的直接动因在于需求收入弹性的作用。随着收入增长, 人们对于农产品的需求递减, 而对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及劳务的需求上升, 因而劳动力在农业中的配置比重将下降, 而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比重将会上升, 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中并实现就业。

此后, 1954 年, 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 (W. Arthur Lewis) 在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 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即“二元经济模型”^[3]。刘易斯模型的核心观点是依靠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发展来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 其基本思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获得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 所以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伴随着这种转移, 工业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 而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 直至二者相等时, 劳动力才停止转移。此时,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所有剩余劳动力, 在城市工业部门中实现了充分就业。所以, 从刘易斯模型中可以看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实现就业的

① “六普”中的流动人口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一个重要前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即二者差距缩小。

2. 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转移

1960年，舒尔茨（Thodore 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知识将成倍显现于生产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才是经济增长最大和最基本的原因。人力资本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起，以明瑟尔的研究为代表，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容及其形成，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力资源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一种非物质资本，是对生产者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人口迁移等支出（直接成本）后价值在生产者身上的凝结。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技能和健康素质等质量因素存量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4]。狭义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广义的人力资本还包括健康。明瑟尔认为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在今后若干年内有希望得到补偿的初始费用。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其中教育投资是主体，又可分为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两类。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状况做了较多的研究。罗明忠对在广东打工的外省市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为24.20%，而“受教育程度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内容”^[5]。张艳华利用山东、安徽、四川三省农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外出劳动力成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公司职工、个体经营者，甚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概率相对增加；职业培训、专业技能等对外出劳动力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在受调查者看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能否成功实现乡城转移和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6]。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假设

1. 数据及变量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及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根据文献理论和调查问卷中的相关内容，本文研究变量的选取及界定如下。

（1）因变量。流动人口从业状态，分为两类：就业（包括打零工等状态）；无业/失业。

（2）自变量。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分为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三大类。其中前两类数据从调查问卷中获得，经济结构则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①人口学特征。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两部分，在本文中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相关分析。②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体现的是个体差异，包括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就业培训、外出打工时间（工作经验的一种体现）三部分。③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体现的是地区差异，包括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两部分。具体内容及计算公式如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 =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某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该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 = 城镇居民粮食支出金额 / 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金额。

2. 研究假设

假设1：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从业状态，人力资本越丰富，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明瑟尔认为人力资本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经验三部分，其中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共同构成教育）是主体。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过职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外出打工时间较长）者，人力资本存量较多，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假设2：流动人口迁入地的经济结构影响其从业状态，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实现就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缩小。一般来讲，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则二者的比值即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的值小于1。流动人口迁入地的这个比值较高，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较小，农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力较弱，而非农产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力较强，则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费希尔-克拉克假设，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就业的直接动因在于城市居民随着收入增长而对农产品的需求递减。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较低，意味着城镇居民对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低，而对非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高，从而刺激城镇第二、三产业的扩张和发展，则流动人口更容易在城镇实现就业。

四、中国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1. 流动人口的总体特点

中国流动人口总体的就业率^①为97.6%。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3.8%，超过九成者为20~49岁的青壮年，其中又以20~29岁的年轻人最多。平均年龄为31.85岁，年龄中位数为31岁。有近83%的流动人口接受过初中教育，但仍然有1.9%的人未上过学，且仅有12.5%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有26.2%的人已外出打工6~10年，25%的人则超过10年。用所有人外出打工时间之和除以总人数，可得流动人口平均外出打工时间约为7.1年。可见，中国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为：就业率较高；男性较多；年龄结构较年轻，以青年人为主；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初中水平为主；接受过就业培训者很少；外出打工时间较长（详见表1）。

2. 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把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经济结构及从业状态等各变量全部纳入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 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首先，受教育程度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高中学历者的就业发生比^②是未上学者的0.751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这一数值则为0.595。从上述三种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其就业发生比反而较低。

这一现象与研究假设1中的部分内容不相符，可以从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结构作出解释，如表3所示。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从事较多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在全部15种行业中，上述6种行业的就业人数总共占比为89.4%，

表1 流动人口的从业状态、人口学特征和

变量	人力资本状况		
	分类	频次(人)	频率(%)
从业状态	就业	106976	97.6
	无业/失业	2581	2.4
性别	男	58920	53.8
	女	50637	46.2
年龄	10~19岁	6954	6.3
	20~29岁	40474	36.9
	30~39岁	39183	35.8
	40~49岁	20386	18.6
	50岁及以上	2559	2.3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2095	1.9
	小学	16710	15.3
	初中	58615	53.5
	高中	22857	20.9
就业培训	大专及以上学历	9279	8.5
	接受过	12959	12.5
	未接受过	91011	87.5
外出打工时间	0~5年	53435	48.8
	6~10年	28692	26.2
	11~15年	16681	15.2
	16~20年	7870	7.2
	21年及以上	2879	2.6

注：1. 总人数为109557，“就业培训”缺失人数为5.1%，其他变量无缺失。2. 高中包括中专，下表同。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0年上半年）。

① 本文中的就业率指就业人口与总人口、无业/失业人口之和的比值。

② 发生比又称为相对风险，它是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在本文中即就业的概率与无业/失业的概率之比。

表2 流动人口从业状态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变量		B	S. E.	Wald	df	Sig.	Exp (B)
性别	男	0.714	0.043	282.176	1	0.000	2.043 ***
年龄	10~19岁			260.752	4	0.000	
	20~29岁	0.356	0.075	22.450	1	0.000	1.427 ***
	30~39岁	0.512	0.082	39.464	1	0.000	1.669 ***
	40~49岁	0.562	0.092	37.316	1	0.000	1.755 ***
	50岁及以上	-0.839	0.113	54.717	1	0.000	0.432 ***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63.291	4	0.000	
	小学	-0.025	0.150	0.028	1	0.868	0.975
	初中	-0.052	0.146	0.128	1	0.721	0.949
	高中	-0.286	0.149	3.667	1	0.056	0.751 *
	大专及以上	-0.520	0.156	11.125	1	0.001	0.595 ***
就业培训	接受过	1.366	0.104	172.345	1	0.000	3.918 ***
外出打工时间	0~5年			29.607	4	0.000	
	6~10年	-0.057	0.050	1.278	1	0.258	0.945
	11~15年	0.117	0.069	2.905	1	0.088	1.124 *
	16~20年	-0.036	0.090	0.161	1	0.688	0.964
	21年及以上	-0.542	0.115	22.083	1	0.000	0.582 ***
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		5.046	0.365	190.773	1	0.000	155.407 ***
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		-0.233	0.041	32.687	1	0.000	0.792 ***
常数项		2.632	0.208	160.170	1	0.000	13.896 ***

注: 1. Chi-square = 1141.232, Sig = 0.000, Nagelkerke R Square = 0.053; 2. *, **, ***分别表示在0.10、0.05、0.01水平上显著。

接近九成,而这些行业几乎全部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这种产业对从业者的要求更多地体现在“量”上,而不是“质”,它并不需要具备很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一般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即可从事。与此同时,企业雇主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在劳动力文化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无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雇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工资成本。

此外,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其在寻求职业时的心理预期也较高,在某一工作单位丰富了技术知识和经验阅历后,为了找到更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工作而离职的概率则较大。换言之,他们的提升空间和潜力以及自身向上发展的动力相对较大,增加了离职的可能性。有关调查和研究表明,较高学历的员工一方面工作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会比低学历员工得到更多的外部机会,更容易受到新工作机会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工作稳定性较差^[7]。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企业雇主为了减少培训成本和增强盈利的可持续性,更愿意聘用受教育程度较低但工作稳定性较强的劳动力。

一些调查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困难。2003年,“用工荒”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此时企业感觉到的是“技工荒”。而发展到当前,则是“技工荒”和“普工荒”的双重“荒”,且“普工荒”已遍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表4反映了2010年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岗位的求人倍率^①。除去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岗位,其求人倍率越低。职高/技校/中专、高中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意味着这些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为卖

① 求人倍率指工作岗位需求数与求职人数之比。

行业	就业人数比例	行业	就业人数比例
农林牧渔	1.1	金融保险房地产	1.1
采掘	0.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	4.1
制造	40.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0.8
建筑	6.2	教育文体及广播电影电视	1.1
电煤水生产供应	0.4	科研和技术服务	2.4
批发零售	17.7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0.3
住宿餐饮	10.3	其他	3.0
社会服务	10.8		

资料来源: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0年上半年)。

方市场，劳动力供不应求，就业相对容易；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求人倍率全部低于1，意味着这类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为买方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较为困难。可见，在现有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低端蓝领劳动力需求旺盛，显示出持续性短缺迹象，“用工荒”主要表现为“廉价劳动力荒”，则此类劳动力实现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就业培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接受过就业培训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比未接受过的流动人口高出近3倍，差距较大。

相比于学校教育，就业培训是一种目的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的教育方式，具有时间短、成本低、见效快等特点，能帮助受培训者较快、较好地掌握生产或服务所需的技术知识，不断积累、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接受过政府组织的与就业相关的培训，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提高他们实现就业的概率和从业质量，还有助于他们尽快融入职业岗位和行业环境中，进而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最后，外出打工时间中，11~15年和21年及以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比于外出打工0~5年的流动人口，外出打工11~15年的人的就业发生比是前者的1.124倍，高于前者，而21年及以上的人则是0.582倍，低于前者。

这种现象不仅与人力资本有关，也与人的生理周期有关。图1反映了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分布状况。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集中于10~29岁之间，其中又以20~29岁为最多。进一步地，计算出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平均年龄为24.79岁。以此为准，外出打工11~15年后，其年龄约为35~40岁，正值壮年时期。一般来讲，这个年龄段是人一生中体力和智力最为充沛、成熟的时期，再加上多年打工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从而更容易实现就业。继续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至21年及以上，此时年龄约为45岁及以上。尽管流动人口拥有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一般来说，因为生理周期的影响，人的体力、智力都趋于下降，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工作强度的承受能力均有所减弱。企业不得不考虑其用人的培训成本以及员工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可持续性，因而在聘用此类流动人口时更为谨慎，从而增加了他们实现就业的难度。

这种现象不仅与人力资本有关，也与人的生理周期有关。图1反映了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分布状况。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集中于10~29岁之间，其中又以20~29岁为最多。进一步地，计算出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平均年龄为24.79岁。以此为准，外出打工11~15年后，其年龄约为35~40岁，正值壮年时期。一般来讲，这个年龄段是人一生中体力和智力最为充沛、成熟的时期，再加上多年打工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从而更容易实现就业。继续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至21年及以上，此时年龄约为45岁及以上。尽管流动人口拥有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一般来说，因为生理周期的影响，人的体力、智力都趋于下降，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工作强度的承受能力均有所减弱。企业不得不考虑其用人的培训成本以及员工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可持续性，因而在聘用此类流动人口时更为谨慎，从而增加了他们实现就业的难度。

表4 2010年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岗位的求人倍率

文化程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初中及以下	1.15	1.09	1.05	1.13
高中	1.08	1.08	1.08	1.10
职高/技校/中专	1.27	1.10	1.29	1.35
大专	0.88	0.87	0.89	0.89
本科	0.88	0.78	0.73	0.78
硕士及以上	-	0.68	0.67	0.71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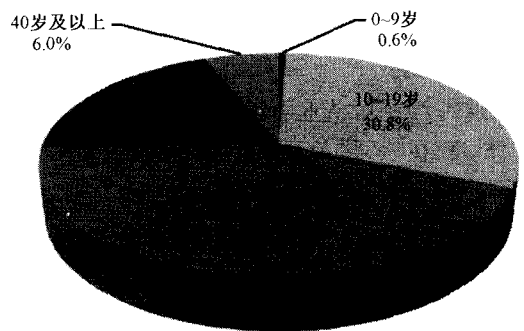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0年上半年）。

(2) 经济结构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一方面，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流动人口所在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值每增加1个单位，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将比原来提高154.407倍，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较大，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流动人口迁入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值较高，意味着农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用产值比重衡量）相比于其对地区就业的贡献（用就业人数比重衡量）较大，即农业对国民收入的相对贡献较大，则农业部门对当地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力较弱；而非农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相比于其对地区就业的贡献较小，即非农产业对国民收入的相对贡献较小，则非农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力较强。一边是当地农业劳动力难以“挤出”，另一边是当地非农产业部门容易“吸入”劳动力，从而使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实现就业的可能性得以较大程度提高。

另一方面，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流动人口所在地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将是原来的0.792倍，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生产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而消费结构引导生产结构。所以，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能否实现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意味着他们对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低，而对非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高，从而引导并刺激城镇中与非粮食类消费相关的生产和服务，即第二、三产业的扩张和发展。从表3中可以看出，仅有1.1%的流动人口从事农业，其余则全部从事第二、三产业。所以，较低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使流动人口更容易在城镇实现就业。

五、结语及相关建议

1. 主要结论

根据前面的理论文献分析和实证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从业状态，人力资本越丰富，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接受过就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流动人口，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统计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较小，这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多集中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都证明了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它不仅能提高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概率，还能提高劳动力就业的选择能力和从业质量。

此外，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继续实施和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出现下降。这意味着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而使经济得以迅速增长的局面将要结束，人口红利总有一天会消失。所以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升级，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升级必将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就业实现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

第二，流动人口迁入地的经济结构影响其从业状态，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2. 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实现就业，进而实现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结论，笔者认为可以从提升人力资本和优化经济结构这两大方面，进行政策改善并出台相应措施。

(1) 提升人力资本。一方面，要完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都来自于农村，因此，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尤为突出。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以及中国内部制造业的发展和梯次转移，具有良好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农村外移劳动力将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农村基础教育是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制度体系，也是高效、廉价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必然选择，而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

具体地，对于基础教育，国家应当加大义务教育政策宣传和执行的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教学设施，提高师资质量，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促进教育公平，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教育公平。对于职业教育，国家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切实改善职业教育场所的软、硬件条件。

另一方面，要加强就业培训和在职培训。就业培训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实现就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初次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职培训则非常有利于流动人口改善从业环境和质量或者再择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再次提升。为了加强就业培训和在职培训，建立起一套高效、连贯、实用的劳动力培训体系极为必要，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必须注重时效及实效，与市场企业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并保障培训的持续性。政府应把流动人口的就业培训纳入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的民生事业

中去,将其作为流动人口就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适时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流动人口进行就业培训。企业内部要建立起常态的在职培训机制,应拿出部分利润,通过税前列支用于员工的技能培训,并使在职培训成为员工福利待遇的一项必备内容。

(2) 优化经济结构。一方面,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产业布局整合,增加非农产业的有效就业人口。增加非农产业的有效就业人口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缓解对一般受教育程度劳动力过于旺盛的需求,二是提升对较高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控制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兴建,淘汰产能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附加值较高、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先进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上来。

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立足于全国,制定区域战略规划,加强区域分工协作,缓解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的冲突。由于东部流动人口中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力比在西部更难就业,所以要在宏观上指导东部地区转移出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和支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以此缓解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方面的竞争。而中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也应该考虑未来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变化,有意识地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同时,东部地区要在技术和资金上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这种升级给予支援和帮助。

另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对扩大消费规模和升级消费结构进行引导。改善消费水平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要扩大居民的消费规模以提高消费数量,还要升级居民的消费结构以提高消费质量。收入的增加,不仅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扩大其消费规模,还能降低居民的粮食支出比例,使其消费结构得以升级。所以说,提高收入水平是改善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不仅如此,还应采取其他措施对居民消费进行引导、鼓励和支持。

扩大消费规模,一是要提高收入水平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大力发展民生,要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事业的比例,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举措能从侧面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升级消费结构,既需要增加居民收入,还要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应在舆论上大力宣传并倡导文明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并运用经济、法律和政策的杠杆效应引导居民转变消费结构,改善物质消费与非物质消费、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的比例关系,同时要加快与非物质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有关的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0.
- [2] 刘伟. 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流民”的考察 [M] //刘伟经济文选.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86-98.
- [3] 郎永清. 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以劳动力转移为主线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 [4] 刘朝臣, 鲍步云.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 [5] 罗明忠. 农村劳动力转移: 决策、约束与突破——“三重”约束的理论范式及其实证分析 [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 [6] 张艳华.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积累、收益机制研究 [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
- [7] 金冬梅, 温志毅. 员工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研究——以“80后”离职员工为例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 (3).
- [8] 胡宏伟, 孟颖颖.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方式与劳动力收入——进城农民收入分布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M] //中国城市研究 (第二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46-61.

[责任编辑 方志]